

唐代制举孝悌类科目考论

田子爽

(西安财经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孝悌类科目是唐代制举德行类科目中的一种,儒家孝文化是其思想基础。自汉朝设置孝悌力田官职以来,孝悌品行成为国家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孝悌类科目频繁出现在中唐以前,晚唐时期较为罕见,主要原因在于唐王朝前期积极提倡儒学,重视孝道。孝悌类科目作为唐王朝施行仁德之政的产物,体现了国家用孝悌观念感化人伦,稳定社会秩序的期望,但因录取标准低和自身的局限性等因素,孝悌类科目逐渐失去了在选才制度中的地位。

关键词:制举;孝悌类;科目;孝文化

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9)02-0109-04

唐朝皇帝会在科举的常科之外开设制举,亲自选拔特殊人才。在选拔之初,皇帝会以诏书的形式说明人才的类型、选拔标准,即制举科目,以此选拔出不少在德行、才能、文学方面有着突出表现的人才。其中,德行类科目体现了国家对官员品行的重视。其大致有三类:贤良类、志向类、孝道类。孝道类科目,《登科记考》中仅见有孝通神明科、孝弟鲋直科、孝弟廉让科、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今人整理并统计有12种:孝悌淳笃兼闲时务科、孝悌淳笃节义昭显科、孝弟力田素行高于州里科、孝悌通神遐迩推敬科、孝悌力田科、孝弟耿直科、孝悌廉让科、践孝友之行可以劝率生灵科、孝行过人乡闾钦伏科、孝悌力田闻于乡闾科、孝通神明科、孝廉茂才科。^{[1](P476~480)}从名称上看,其大都强调儒家的孝悌伦理道德思想,可统称此类科目为孝悌科。孝悌科在中唐以前多次出现,承载着儒家孝悌思想意涵的制举孝悌类科目,作为选拔特殊人才的标准,是唐王朝推行仁德之政的产物。

孝悌类科目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儒家的孝文化。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孝就已具备丰富的思想意涵。

孝悌思想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孝即孝敬父母,感念父母的生养之恩并奉养父母,尽子女之孝道;悌即友爱兄弟,兄弟之间友好相处。儒家经典非常推崇孝悌:“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曾参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称之。”(《孔子家语·弟子行》)孔子将孝置于四德之首,是君子之德行形成的开端和基础,悌次之。《孝经·开宗明义》中的“夫孝,德之本也”之言,将孝视为一切美好品德之根本。鉴于孝悌在品德修养上的重要作用,孔子主张用孝悌教化百姓,认为孝悌可以帮助人们相亲相爱,礼顺和乐,使天下一团和气。《论语》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正是由于儒家把家之孝道扩展至社会、国家层面上,因而,孝也就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准则:“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母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孝悌(友)在治理国家上的重要作用,孟子的“尧舜之道,孝悌而矣”一语,则直接将孝悌与治国之道联系在一起。尧舜被后世国君奉为榜样,孟子认为,尧舜的治国之道其根

收稿日期:2018-1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唐代制举与儒学研究”(17XJC751006);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唐代制举选才的儒家意识研究”(18JK0301)

作者简介:田子爽(1982-),女,河南安阳人,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科举制度与文学研究。

本就是孝悌。儒家在阐释孝悌的意涵时,赋予其鲜明的道德化、社会化、政治化色彩,对后世封建君主治理国家、选拔人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汉惠帝时,初次设立孝悌力田的官职,俸禄每人二千石。此举对之后以孝选官,选拔具备孝悌品行的人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儒家思想成为汉朝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孝悌成为官吏们举荐贤才的一个重要标准。汉文帝十二年,当时并无孝悌力田之士应察举之令,因而文帝下诏,提升孝悌力田官员的地位:“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2](P124)} 皇帝深知,相比于三老、力田、廉吏这样的官员,具备孝悌品行的官员在确保社会秩序安稳顺畅,教化百姓上的作用更为明显。因而,后世的皇帝们在亲自选拔人才之时,孝悌便成为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东汉光武帝诏取四科,“皆有孝悌廉公之行”作为四科的标准。魏晋南北朝虽然动荡不安,玄学盛行,但是仍有皇帝们亲自选拔孝悌官员的记载。泰始四年(268年)六月丙申,西晋武帝下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3](P57)} 南朝梁武帝于天监十四年正月,亲祠南郊,下诏举荐孝悌力田者。北魏时魏献帝于延兴三年十一月,诏选“力田孝悌,才器有益于时,信义著于乡闾者”,并于太和十七年、十八年,三次诏选“孝悌廉义、文武应求”的人才。

隋朝,科举制度正式开启,其中在特科的人才选拔上,大业三年四月甲午,隋炀帝下诏:“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4](P68)} 诏书中的“孝悌”是人才的基本要求。隋炀帝希望在此基础上,选拔诸如德行、文学、才能之士。

唐朝开国之初,同样认识到了孝文化在治国施政上的作用,继承了两汉以来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唐太宗将孝的意涵更加具体化:“孝者,善事父母,自

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5](P917)} 并于贞观三年下诏:“百行之本,孝道维先。”明确将孝道作为官员道德品行之根本。唐代多将孝悌称之为孝友,如《旧唐书》《新唐书》皆列《孝友传》,记载闻名朝野、有孝友品行的“闾巷刺草之民”。《旧唐书·孝友传》:“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夫善于父母,必能隐身锡类,仁惠逮于胤嗣矣;善于兄弟,必能因心广济,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承上而顺下,令终而善始,虽蛮貊犹行焉,虽窘迫犹亨焉!自昔立身扬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5](P4917)} 孝顺父母的人,必能造福于后代,友善兄弟的人,必能在宗族中树立德信,因而具备孝友品行的人自然能够辅助国君施行善政,感化人心。最后再次强调,古时具备孝友品行的人,都因此立身扬名的。唐王朝对孝友(悌)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刘秩的《选举论》云:“汉室干戈以定祸乱,贵尚淳质,高后举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变,故下有常业,而朝称多士。”^{[6](P3785)} 这对唐朝皇帝在制举中设置孝悌类科目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

从《唐大诏令集》等相关文献来看,制举中孝悌类人才选拔主要集中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开国初年的制举虽未直接选拔孝悌类人才,但皇帝在制举诏书中直接表明了对孝义的重视,如贞观三年四月下《赐孝义高年粟帛诏》赏赐孝义之家,贞观八年正月的《遣使巡行天下诏》赏赐孝悌力田者,直到贞观十一年下《采访孝悌儒术等诏》令河北、淮南诸州长官精选“孝悌淳笃、兼娴时务”者,明确选拔孝悌类人才,既要求应举者有质朴笃定的孝悌意识,还要有处理时务的娴熟能力。

初唐时期,孝悌类人才的选拔较为频繁,尤其是太宗、高宗朝。贞观十五年,太宗意欲封禅泰山之际,下《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天下诸州举荐“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的人才。贞观十九年,李治监国,令州郡举荐“孝弟力行,素行高于州里”的人才。高宗显庆五年六月,下诏举荐“孝悌可称,德行夙著,通涉经史,堪居繁剧”的人才。仪凤元年十二月,下《访孝悌德行诏》,委巡抚大使,咸加采访“孝悌通神,遐迹惟敬”的人才。调露元年七月,下令洛州荐举“孝弟纯至,感于神明”的人才。永淳二年七月,高宗下诏天下岳牧及京官五品以上,各举孝行儒学文武之士。从选拔的标准来看,太宗希望孝悌类人才不仅具备笃定的

孝悌品德,还能够具备处理政务和感化社会风俗的能力,品行和实用二者兼备,德行合一。高宗则注重孝悌品德,如孝悌的名望是否远播、孝悌的纯正是否能感动神明,明显强调孝悌品行这个抽象的衡量标准,对于人才的实用能力却并未提及。武则天永昌元年《求访贤良诏》,令文武官五品以上举荐“践孝友之行,可以劝率生灵”。此时的选拔条件比较注重孝悌人才的实际行动及其感化作用,带有佛教的慈悲意味。唐中宗神龙元年九月,令内外文武五品以上官并县令、京师清官九品以上,各举孝悌、廉让一人,选拔标准仍是注重孝悌品行。

唐玄宗时期,虽然现存的制举诏敕中并无很多孝悌类人才的选拔,但天宝三年十二月孙逖的《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制》云:“自古圣人,皆以孝理,五常之本,百行莫先。移于国而为忠,事于长而为顺……百姓间有孝行过人乡闾钦伏者,所由长官具以名荐。”^{[7](P2152)}其中仍有记载说明其对孝悌类科目的重视。玄宗继位之初,即于先天二年七月,下《遣毕构等慰抚诸道制》,开设制举选拔人才,其中有“敦崇仁厚,务修孝悌”之言,提倡与鼓励孝悌。开元二十三年,张九龄的《藉田赦书》举荐孝悌力田乡闾推挹者。开元二十三年十月,玄宗下诏:“文学政事,必在考言;孝悌力田,必须审行。顷从一概,何谓四科?其孝悌力田举人,宜各自疏比来事迹为乡闾所委者,朕当案覆,别有处分。”^{[8](P7671)}明确从品德行为上来考察孝悌类人才。开元二十六年,下《孝悌力田举人不令考试词策敕》:“孝悌力田,风化之本,苟有其实,未必求名。比来将此同举人考试词策,便与及第,以为常科。是开侥幸之门,殊乖敦劝之意。自今已后,不得更然。其有孝悌闻於郡邑,力田推于邻里,两事兼著,状迹殊尤者,委所由长官,特以名荐,朕当别有处分。更不须随考试例申送。”^{[9](P542)}可见,玄宗注重孝悌类的品行,不依制举常规试策的选拔方式。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孝悌科目仍很重视。唐肃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于灵武,诏取孝悌力田等类型的人才。至德二年正月下《访至孝友悌诏》:“至和育物,大孝安亲,古之哲王,必由斯道。朕往在春宫,尝事先后,问安靡阙,侍膳无违。及同气天伦,联华棣萼,居常共被,食必分甘。今皇帝奉而行之,未尝失堕。每有衔命而来,戒途将发,必肃恭拜跪,涕泗交涟,左右侍臣,罔不感动。间者旭日抱戴,赤乌白狼之瑞,接武荐臻,此皆皇帝圣敬之符,孝友之感也。故能诞敷德教,横乎四海,信可以光宅寰宇,永绥黎元者哉。其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乡闾,堪旌表者,

命郡县长官采听闻奏,孝子顺孙,乐于玄化也。”^{[9](P523)}连年受战乱侵扰的唐王朝,上至国家,下至百姓,都渴望和平安顺的生活。唐肃宗在战乱流离中登基皇位,迫切希望以孝悌意识感化天下,包括叛军,希望他们归顺。唐肃宗后又多次诏举孝悌人才,至德二年十二月诏“百姓忠孝力田,不求闻达”者。乾元元年十月,诏举忠正孝友的人才。广德元年七月下《册尊号赦》,诏取“孝悌力田,经术通博”的人才。乱世中希望孝悌科目发挥作用,流露出唐肃宗治国安邦、重振大唐国威的决心。唐代宗于永泰元年正月,下《改元永泰赦》,诏举“孝悌力田”人才。大历元年十一月,下《改元大历赦》,诏举“孝悌力田”人才。唐德宗也极为重视孝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中的“旌孝悌,举直言,养高年,敦本业,平均徭赋,黜陟幽明”之言即为证。同时,唐德宗诏举“孝悌力田、经学优深”的人才,于贞元四年正月诏举“孝悌力田闻于乡里”的人才,皆亲自策试。这个时期的孝悌与力田联系在一起,是有现实原因的。安史之乱后,兵祸中原、藩镇割据、赋税繁重、自然灾害等社会问题,令农民日益无心耕种,民无恋本之心,流民、逃户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此刻的孝悌力田科,更能体现出唐王朝劝民务本、安抚民心之意。正如韦处厚在《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中所言:“臣又闻理国之本,富之为先;富人之方,劝农为大。三代以耕藉率天下,汉朝以孝悌配力田,皆劝之道。”^{[7](P2488)}

约在唐宪宗之后,孝悌科目就比较罕见了。唐王朝急需大量具有吏治才能的官员,能够扭转颓废之势,重振大唐盛世。最为常见的品行类制举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被认为“定科”,不仅要求官员品行端正贤良,还具有讽谏匡政的政治作用。孝悌类的科目偏重于道德品质的修养,由于国家秩序的日益动荡,其已经无法有效发挥孝悌感化人心的作用。

三

制举孝悌科作为唐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皇帝们的执政理念。《中庸》中的“欲行仁道于天下,必先行孝悌以事父母兄长”,即说明孝悌在仁政中的重要地位,国君的统治应植根于孝道而以孝治天下。所谓孝治,即遵从孝道的规范与要求,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在维系人伦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达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因而,唐王朝从开国之初,即推行仁德之政、

政教合一的治国策略,提倡“政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大”的施政原则(《新唐书·儒学下》)。

此外,孝悌类科目也是唐王朝选拔忠臣的一个途径。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统一的皇权政治社会,皇权政治需要品行纯良的忠臣,而孝道是一切德行的根基,选拔忠臣当然从孝悌入手,“教孝求忠”,“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事亲尽孝,事君自然以忠。《新唐书·孝友传》中的“赞”曰:“圣人治天下者有道,曰‘要在孝弟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国,国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从,其失则以法绳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单人,行孝一概,而凶盗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10](P5592)}从中可以理解皇帝们多立足于儒家孝悌、仁义的思想来表达对贤才之渴求,因为这既可以选拔出品行恭顺的忠臣,又能感化社会民众,此即制举孝悌科的最大功用之所在。到了晚唐,由于社会环境的混乱,孝悌科已经失去“孝悌”的感化作用。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制举孝悌类科目的实际选才效果并不理想。制举科目本身即皇帝选拔才的标准,不少制举科目是临时设立,有的科目甚至只出现一次。孝悌类科目多次被设置,是唐王朝重视官员的孝悌德行的表现。制举科目中有不少德行类科目,如贤良方正科、志烈秋霜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直言极谏科、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哲人奇士逸伦屠钓科、道德资身乡闾共挹科、安心畎亩力田之业夙彰科、养志邱园嘉遁之风载远科、隐居邱园不求闻达科、疾恶科等。从开设情况来看,孝悌类科目仅次于贤良类、隐逸类科目,然而,《登科记考》中的登科记载极少,仅见有:天授二年,孝弟耿直科;神龙二年,孝弟廉让科,郭思训、郭思谟、赵陵阳及第;建中元年,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郭黄中、崔浩、李牧及第;贞元四年,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张皓及第。《唐会要》中记载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明朝的陆深、李日华皆对制举科目名称进行了考证,孝悌类仅见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陆深在考证唐代制举科目云:“大抵名义琐屑,因时就俗,固不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与秀才茂异之雅重也。若究本论之,则孝弟力田闻于乡闾一科,犹有乡举里选之遗意,施之实用,有足征者。”

这些种种,与制举诏敕中孝悌科目频繁举行的热闹现象似乎有些悖离。有研究者认为,“正如玄宗诏所云‘孝悌、力田,必须审行’,主要是审查其在孝

悌、力田方面的行为表现,行为表现往往会伪善饰行,矫揉造作,所以此类科举很难选拔出真知孝悌、力田之人,故此类科目一直不盛,取人很少。”^{[1](P480)}此外,孝悌科录取的标准过于单薄,开元十七年杨场的《议学校贡举疏》:“臣伏见承前以来制举通迹丘园、孝悌力田者,或试时务策一道,或通一经,粗明文义,即放出身,亦有与官者,此国家恐其遗才。”^{[8](P7251)}熟读儒家经典《左传》等九部经书,粗浅了解经义,就可以被举荐应制举,得到做官的机会,这不得不令人生疑。由于孝悌科录取的标准低,其已经影响到了此科的选才效果。

由上,唐代制举孝悌类科目与唐王朝的国运紧密相连,一方面承载着选拔孝悌品德的人才,另一方面则传播儒家孝文化,给社会民众树立了一个孝悌美德的品行标杆。然其单纯以孝悌品行作为选拔标准,而缺乏实际政务能力的考核,不仅在动荡的晚唐不合适宜,在宋代制举中,仍不免处于尴尬的境地。宋初的制举中,仍有选拔孝悌类人才的记载。如宋太祖开宝三年正月,诏诸道、州、府,举荐百姓中有“孝悌彰闻”的人才,亲自策试。“开宝八年,诏诸州察民有孝弟力田”的人才,但是到了开宝九年,“诸道举孝弟力田及有才武者凡七百四十人,诏翰林学士李昉等于礼部试其业,一无可采。而濮州以孝悌荐名者三百七十人,帝骇其多,召对讲武殿,率不如诏。犹自陈素习武事,复试以骑射,辄颠陨失次。帝给曰:‘是宜隶兵籍。’皆号呼乞免,乃悉罢去。诏劾本部滥举之罪”^{[11](P3645)}。虽然,孝悌类科目在某些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不适合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但孝悌仍是每个历史阶段都应提倡的优秀品质与美德。

参考文献:

- [1]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5]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 [8]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9]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0]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